

主潮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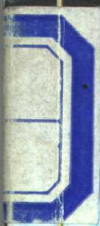
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

90NIANDAI WENXUE CHAOLIU DAXI

李复威 主编

吴思敬 编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

李复威 主编

主潮诗歌

吴思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主潮诗歌/吴思敬编选.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9

ISBN 7-303-05002-7

I. 主… II. 吴…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434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82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总序

□李复威

二十世纪的历史帷幕正徐徐落下，在世纪之交之际，文坛沉浸在回眸与前瞻的思考的氛围之中——总结这一世纪文学演进的成果和经验，展望下一个世纪文学发展的前景。九十年代的文学情境已自然成为百年来的最后一道风景线，其独享天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兴趣。

—

也许是经历了多年的实践的检验，在尊重文学自身特点和规律的呼吁下，文学界逐步摒弃了编写、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政治变迁为依附的分期方法，渐次树立起“世纪意识”与“十年节奏”的发展观。十年，虽然时限比较短暂，虽然起始和终结的界限难

以泾渭分明，但是，它往往能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生态环境，呈现出某种联通共存的凝聚性和沉浮变衍的阶段性。德国作家歌德说过：“时代给予当时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看来，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文学情况亦然。这种“十年节奏”的确立，为我们采用编年史式的文学进程的研究奠定了共识的基础。

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成果的评估，人们一直习惯于将刚刚逝去的前一阶段作为最初的参照系，总是希冀能从中看到某些新的因素、新的发现、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发展源。这样，文学界顺理成章地热衷于进行着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的比较、对照。这种运作的初始，往往会使人陷入一种犹豫的心态和尴尬的局面。

毋庸置疑，八十年代是我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繁荣期。它走出了历史的泥泞，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等一个又一个文学热点的转换：从创作的复苏到文学的振兴；从步调整齐的轰动效应到旋律驳杂的声部交错；从文学之门的开启到各种外国艺术潮流的全面引进；从创作倾向的多样化到美学思潮的多元化……有的评论家甚至断言，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当年名家迭出、佳作涌现，出现过尊重作家、珍视文学的浓烈的社会氛围和超强的价值观念，如茅盾先生所言：“……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有口皆碑”。尽管八十年代文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无疑为九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高的历史起点。

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态势与八十年代后期并无鲜明的界线。许多重要的文学特点和现象都是顺势沿袭过来的。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呈现出的“文学圣殿的倾斜”、“作家光环的暗淡”、

“轰动效应的失却”等还有增无减。一时间作家圈内，有的辍笔、有的改行、有的下海……令人困惑不解。文学创作的纷纭之态也达到“乱花迷眼”的程度。铺天盖地而来的通俗文学几乎将严肃文学排挤得无容身之地。难怪当时有的评论家一度以“衰落”、“危机”、甚至“死亡”等极端化的字眼表示出严重的忧虑。及至九十年代中叶，经过一阵混沌状态之后，文学情势方逐步显露出一些独立的品格和异样的气质。

二

世界冷战局面的结束及多极化格局的出现，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日益强化，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形成九十年代文学演进的大时代条件。而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观念的不断深化，图书竞争市场新格局的出现，作家写作方式的现代化改善，文化传媒手段的丰富化……造就了九十年代文学存在的具体的生态环境。这一切因素无疑制约了这十年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总体构架。

近些年来，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引起了人们生存形态、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思维习惯、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的变衍。这些变衍一直还处于追寻、比较、探索的时期，还没有获得稳定的、规范的价值定位。文学的发展同样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身不由己地接受着方方面面更多的、更复杂的、更微妙的挑战。在文苑内外，见仁见智的歧义、不同看法的矛盾、各自好恶的差异……司空见惯，俯拾即是。这样的态势恐怕会持续到下一个世纪。而处于转型期磨合阶段的九十年代文学只能在无序中的梳理、驳杂中的筛选、困惑中的反思中，日臻显现出自己清晰的形象。

面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策

略必须是、也只能是及时地趋时应变。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在美学意义上的文学多元格局在八十年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平实的、稳健的一步。人们一直认为可能属于短暂性质的多元形态逐步走出了幼稚阶段。在九十年代的中晚期，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构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竞争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这其中，有宽容和理解，也有争议和撞击；有独立的宣言和自我的领地，也有相互的渗透和局部的重叠。同存共荣是凝聚多元的目标与追求。这是令人欣喜的开放体系——我们的文苑真正出现了百鸟欢叫、百树争荣、百花竞开的局面。如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所言：“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而不是同种的一百头禽鸟比赛同一音调的嗓子谁高谁低”。这是来之不易的开放体系——它不仅是文学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结晶，也是文学经历种种曲折坎坷后的经验总结，是文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需求的必然产物。这是渐趋成熟的开放体系——它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文坛的实际不断地平衡着、调整着文学发展种种轻重缓急的关系：切近现实与美学探索，追求理想与适应现状，市场色彩与艺术品位，教化功能与娱乐作用，大众水平与超前意识，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主旋律与多样化，民族化进程与同世界文学接轨……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社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机制在各部门、各行业、各个领域也纷纷健全和完善起来，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竞争，为推动时代进步而竞争，为激活、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竞争，自然成为九十年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内容，也成为文学创作主题内质的基本要素。反腐倡廉文学、改革文学、都市文学、乡镇文学、社区文学……都在这一中轴线上寻觅到自己倾斜的重心。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人生的活剧、情感的波澜、人性的开掘等都悄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的特征。

三

多元格局的开放体系的形成，给九十年代文学带来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新质。在相当数量的先锋文学作家创作纷纷转向之后，九十年代中期，一股势头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显示出创作的活力。一批立足于社会生活底层的中青年作家，积极关注当今转型期现实的热点问题，以平民的意识去探求、思考改革中的种种无奈和隐患，表现出分享艰难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精神。尽管这些创作还有不小的缺憾，但其反拨的意向和冲击的效果是有启示意义的。联系到当前世界文坛上的回归社会现实、回归文化传统的潮流的涌现，这股冲击波无疑还给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文学发展的信息。

随着我国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和都市人职业结构的变衍，原有的以小农经济形态为背景的市井文学和工业题材文学在名副其实地向现代都市文学转化。渐趋浓郁的都市文化意蕴，日益绚丽的都市生存景观，全面开放的都市文明观念，愈显个性的都市风俗世情……交织构成都市文学的创作特色。都市规模的宏伟化、社会消费的超前性、金融意识的成熟度、科教地位的尖端性，以及都市人的新的人际矛盾、欲望追求和精神困扰……给都市文学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传统意蕴最为浓郁的乡土文学，也因为乡镇工业的发展、城乡交流的加强和农村人现代意识的进步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进程。

八十年代中期已展露丰采的女性文学演进至九十年代，由于一批晚生代女作家的加盟更显出骄人的成绩。三代人顺承的女性作家汇集成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创作集团，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大领域中纵横驰骋。这在一向以男性作家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今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实属一道罕见的景观。

被人们称为“时代的纪念碑”和“文学的重型武器”的长篇小说在九十年代创作数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平均每年八九百部的数目已相当于建国后十七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总和，创下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可惜的是精品力作不多。当然，也有少量积作家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而成的巨制，显示出难得的经典风貌和史诗气魄。杰出的长篇小说往往是文学发展成熟的优生儿，是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标志。众多作家正在为这样的作品的诞生辛勤地笔耕着。另外，九十年代的学者文学在散文园地上成绩斐然。他们重点以随笔和杂感的形式领悟人生、反思历史、探求哲理、针砭时弊，表现出激情的深沉和睿智的超越。其它还有以创造性的虚构化写作而形成的现代寓言文学，以表现人物心理流变而见长的情感分析文学，以现代思维探险熔铸而成的幻想文学等，也都日渐成为九十年代文苑的一朵朵奇葩。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雅文学与俗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走向。它们自身都在进行着一次大调整。出于生存竞争和发展自我的需要，彼此都发现对方有值得汲取的“营养素”。两者从疏离渐渐趋于合流。特别是一些雅文学作家开始从“高雅的创新”和“超前的试验”，转向“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应到看到，九十年代的这种雅俗互补、乃至合流的势头是时代条件、社会国情、文化状况和文学规律共同促成的一种综合效应。雅俗互补、合流并不是在二者之间求得一增一减的平均值，而是共同获得一个再提高的基点，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内，相对出现的合流又会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出现疏离，在先锋文学的创新中渐趋分化。这个周而复始的螺旋式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文学进步、升华的过程。

与八十年代比较起来，九十年代相当数量作家的心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调整自己与变幻不定的种种文学思潮的关系；调整与不同观念和个性的各种类型作家间的关系；调整与层

次各异、趣味有别的不同的读者群的关系；调整与频频变异、难以捉摸的图书市场的关系……在适应多元格局的竞争态势下，求得自我的定位生存和不断发展。浮躁之气渐少，平实之风益多；急功近利之态渐弱，潜心创作之心益强；玩文学的气氛渐淡，职业的敬畏感益浓。尤其是一些个性突出、风格鲜明、勤于探索的作家，在争奇斗艳的美学园地中反复采撷，含英咀华，深层次地把握文学的特点及规律，从群体性走向个体性，从代言人走向自言人，从共语式走向独语式，以私人的角色选择，表达生命的独特冲动；用自我的异样感受，领悟人生的内在奥秘；在个体的精神家园内与心路历程中，寻觅到自己与世界对话的特殊语境和模式，从而进一步展示出艺术的本色魅力，充分发挥其在真、善、美领域内的潜移默化的功能。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标示出九十年代文学创造自己优势的契机，播下未来希望的种子。

四

从传统型文学向现代型文学过渡，从闭锁型文学向开放型文学过渡是二十世纪我国文学演进的总轨迹。在百年来的漫漫历程中，文学经受了阶级搏杀的磨砺，革命烽火的洗礼，反抗侵略的锤炼，新旧转折的欣喜，文坛左右的纷争，百花凋零的浩劫、吐故纳新的探索……时至今日，世纪末的九十年代文学尚不能给这个过渡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趋时中固有的芜杂，多元中兼存的混沌，发展中显示的无序，创新中蕴含的浮躁……仍然表明九十年代文学在这个历史的转变中的不成熟性和未完成性。当然，九十年代文学毕竟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制约中取得了经验，从七十年代文学的衰败中总结了教训，从八十年代的轰动效应中得到了启示，多了几分主见和豁达。它一方面在社会全面走向市场、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发生急速变化的情势下，找准自己的角

色定位，别无选择地趋时应变，求得必要的生存权；另一方面在传统地位余波的影响下和现时变革的适宜的机遇中，翘首前瞻，蓄势待发，把希望和辉煌更多地留给明天。

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说过这样一段蕴意深邃的话：“旧时代的庞大的文化遗物证明，建筑术上最伟大的作品，与其说是个人的创造，不如说是全社会的劳作；与其说是天才光辉的闪耀，不如说是人民创造力量的结果。这是各个民族的遗产，多少世纪留下的积层，社会逐渐蒸发的结果所形成的结晶。一句话，这是特种的有机结构。时代的每一个浪潮都在文化遗物上留下自己的冲积土，每一代都留下自己的一层，每一个人都填上自己的石块”。这段话同样表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程序，启示我们深入思索二十世纪及九十年代的创作业绩和历史地位。历史以前所未有的青睐赋予二十世纪特殊的魅力：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腾飞，科学进步促使人类文明的跃进，现代意识在精神领域中的全面觉醒，世界政治格局的无穷变幻，人类多领域的一体化趋势……处于世纪末这一特殊阶段的九十年代文学无疑也会在我国文学的“积层”上留下自己的“冲积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节奏、适应现代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适应现代人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适应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眼下，它还算不上是色泽清晰、层次分明、构造凝聚的优质土层，但它却是为下一个世纪文学发展而铺垫的饱含着多种多样营养素的底肥。在这一点上，我想它是不会推卸责任和自惭形秽的。

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近四百万字的《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这套选本以十年为期，筛选梳理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并加以评估，其欣赏的作用、总结的意义和资料的价值得到了海内外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丛书很

快销售一空。一九九二年增编再版一次，仍供不应求。

当代人总结同步趋进的当代文学，固然有历史沉淀度和能见度不够的局限，但也具备自己的优势：最熟悉文学演进的时代氛围和社会态势，最了解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心曲隐衷，最能体察当代读者的审美流向和阅读趣味。这种及时的、初步的研讨，一方面对作品的现实价值作出第一手的评判，另一方面也给后世研究这段文学史留下当代人的真切感受和翔实信息，给未来的历史裁决提供新鲜的素材，无疑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九十年代即将结束，该出版社又以令人钦佩的更大魄力和更多投入，决定将这总结十年文学进程的“传统工程”继续下去，筹划出版了这套十八册近七百万字的《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从八十年代的“新潮”到九十年代的“潮流”，这称谓上的更换也标示出这两个十年文学态势上的某些差异。九十年代的众多作品群，往往徘徊在文学现象与美学思潮之间。比一般的“现象”似乎多一点集中的倾向性，较之“思潮”仿佛又欠缺一些必要的艺术哲学的根柢，故以“潮流”命名之，较为妥帖。或以题材分类，或以形式归纳，或以方法集中，难以强求一致，只得不拘一格，恐怕也只有如此方能全面展示九十年代多元文学的真实形态。此次有幸请到众多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参与编选，保证了丛书的品位和质量。

当前，我国图书市场上的“选本热”仍居高不下，且有过多过滥、冗杂重复的倾向。许多读者对此也产生了一种逆反的心理。我想，这并非是选本样式自身存在的问题。古今中外，文学的选本是从未间断过、也不可能间断的。选本的角度新颖，选家的慧眼独具，能取所需于一册，览精华于一体，恐怕是选本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无疑是出版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套书所选均属九十年代内书报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作品。鉴于篇幅的缘故，所选作品以中篇、短篇

为主，有关的长篇只得割爱。作品原则上以发表时间前后为序排列。个别选本因内容需要未按此例。有的应入选的作品因作者授权问题未得顺利解决而未能选用。

如果我们的这种努力能为九十年代文学的梳理和总结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那就会感到十分欣慰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序

吴思敬 □

九十年代的诗坛似乎是个演奏巨型交响乐的舞台，各色各样的乐器在这里发出了或雄浑或纤细、或刚劲或柔和、或和谐或刺耳的交响。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九十年代的诗坛称为多种话语并置的诗坛，正是不同诗人的独特的诗性话语，汇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主潮。对九十年代诗歌的潮流可以从多个向度进行描绘，在我看来，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便是九十年代诗歌显示的平民化的倾向。

提到诗歌的平民化倾向，我不得回想起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一篇有名的文章《平民文学》。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周作人便说道：“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① 这话虽是在八十年前说的，不过对我们考察九十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依然有一定的启发。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九十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

^① 周作人：《平民文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第二一〇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也主要是从诗歌精神的角度来谈的，关键是看诗人是否能真诚地面对自我、面对艺术、面对现实，能否真诚地传达出一定时代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的意识、情绪、心理……

九十年代诗歌所显示的平民化倾向，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及特殊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我们不妨把九十年代同新时期初期做一对比。新时期初期，即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是个启蒙的时代、浪漫的时代。王蒙发表于一九八〇年的小说《春之声》中的主人公尽管坐在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闷罐子车里，却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这感受是有相当代表性的。粉碎了“四人帮”，压在人们精神上的巨石被掀掉了，大家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即使是揭露“四人帮”罪恶的伤痕文学，也依然能透露出一些明丽的亮色。九十年代则是个现实的时代、凡人的时代。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的跋涉，重重难关，举步维艰，使人们对改革开放道路上的盘根错节的阻力有了清醒的认识。特别是，随着卷地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随着以广告为运作基础、以提供娱乐为主要目的的大众文化传媒日益取代了以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对诗歌和诗人的美好称呼早就成了遥远的回忆或隔世的妙语。诗人李小雨慨叹道：诗在历史上是“贵重的帛锦”，而今天却沦落成大街上的“一堆废纸片”，“不比一把老芹菜值钱”。（《关于我写诗》）传媒上不断散布着“给诗歌看病”、“诗成了最不受欢迎的文学形式”这类让人气馁的舆论。拜金潮的涌动削弱了诗人的自信，物欲的喧嚣使诗的神圣性遭到了动摇，要求当年的启蒙者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诗人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乃至生存危机。那些想以诗的高贵来装点自己的伪诗人开始从诗坛撤离。随着启蒙与浪漫时代的结束，是激情与理想的淡化，人们的反思深入了。一些在八十年代醉心于在语言迷宫与纯诗的象牙之塔中徜徉的青年诗人，进入九十年代后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给自己重新定位。

八十年代的某些新生代诗人，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曾持有片

面认识，在他们看来，社会层面的因素是非诗的，与诗的艺术属性无关，至少不能在美学方面有助于诗，因而他们在诗作中竞相逃避对社会现实的负载。这种情绪最初源于对把诗看成是对现实的简单反映的逆反心理。固然，让诗超越现实的层面，让水分蒸发到空中成为云霓，不无道理。但把这种认识推到极端，也往往会走到它的反面。诗飘浮在半空，成为与大地、与人类、与现实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也就难免遭到读者的冷落。那些尽力回避现实的诗人，自认为是在维护缪斯的尊严，实则是画地为牢，大大地缩小了诗的领地，也进一步加速了诗的边缘化。进入九十年代后，许多青年诗人已深刻认识到这点。孙文波近来曾在一首诗中谈过重读自己旧作的感想：“重读旧诗，我感到其中的矫揉造作。/第一句就太夸张：‘他以自己的/胡须推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人的胡须怎么可能推动时代的风尚？/想到当年为了它自己颇为得意，/不禁脸红。那时候我成天钻研着/怎样把句子写得离奇，像什么/‘阿根廷公鸡是黄金’之类的诗名/写得太多啦。其实，阿根廷公鸡/是什么样，我并没有见过；黄金，/更是不属于我这样的穷诗人。写它们，/不过是觉得怪诞，可以吓人一跳。/现在，写了十年诗，我才明白，/谁也不会被我吓一跳，搞糟了的/不过是自己。现在，我终于学会/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改一首旧诗……》）孙文波对旧作的反思，不仅仅是他个人对诗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同时也代表了九十年代青年诗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种对诗与现实关系的反思，自然地渗透在九十年代诗人的创作观念中，导致他们回到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这里所指的民间，不单是一般指称的社会下层的生活，而且包括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而居于被忽视的位置，但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风俗和生活方式等。诗人们以平民化的眼睛透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平常心去体悟琐屑遮蔽下的温馨、去揭示平凡覆盖下的生命价值，从中发掘出易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况味与文化意义，进而改变

了自己的审美趣味，一种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

二

九十年代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九十年代诗歌平民化倾向，突出表现为诗人往往喜欢从身边的平凡事物上取材，从而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以及面临生存危机的疑惧与焦虑。李霞的组诗《现代生活》，把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广告、自由撰稿人、高速公路等写进了诗歌，体现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现代人的焦灼感。谢湘南的组诗《呼吸》、《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则展示了深圳打工族的原生态，从中可以窥见打工生活的紧张、单调与严酷。竹马的《我和我的工厂》，不同于五六十年代来流行诗坛的那些轻松地歌颂劳动、欢快地抒发主人翁感的作品，而是透过抒情主人公的自白，展示了九十年代工厂面临的凋敝、严峻、艰难的生存现实以及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的心态：“我的工厂沉重 我也沉重/我沉重得像废弃的厂房和残损的设备”，这里打动人的是，作者不是以诗人的身份俯视现实、游离现实，而他本人就是现实，已成为庞大而衰老的机器的一部分。白连春的《逆光劳作》，则展示了农村中普通劳动者承受的苦难，像他笔下的“抠藕的人”：“一双关节粗大筋骨毕露的手已不是在抠藕，是在/哭泣！是在为世界难过！抠藕的人在最低的地方/俯瞰这个现实社会，就是白和美越来越少了”。面对漫长的时间之流，面对无尽无休的苦难，诗人与“抠藕的人”合成了一体。那“关节粗大筋骨毕露的手”的意象仿佛一个特写镜头，凝缩了一切苦难；那发自内心的哭泣，是对人的精神家园失落的悲哀。在表现普通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状态上，陈超的《本学期的述职书》与周所同的《住房申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对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报告文本的戏仿，但又各有侧重。陈超的《本学期的述职书》，透过一个高校教师写期末述职书的苦恼，在调侃与自